

冯天瑜 主编

系 书 传 评 人 学 间 型 转

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

洪仁玕

夏春涛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近代史所图书馆惠存

夏春涛

一九九九年十月

冯天瑜 主编

转 型 间 学 人 评 传 书 系

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

洪仁玕

夏春涛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 洪仁玕/夏春涛著.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转型间学人评传书系/冯天瑜主编)

ISBN 7-5351-2433-X

I. 从… II. 夏… III. 洪仁玕 (1822~1864) - 生平事迹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2102 号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电话: 8544373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430015 · 汉口新华下路 192 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0.5 印张

版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4 千字

印数: 1—3 000

ISBN 7-5351-2433-X/K · 67

定价: 19.6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总 序

冯天瑜

历史的演进,多数时段是在同一社会型范内部运行的,但当各种内外条件细缛积淀,达到某种临界点时,整个社会固有的动力定型便发生突破性变更,正如液态水加温到摄氏 100 度时即转化为气态水一样。纵观人类历史,曾发生过几次大的社会转型,如从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转型(核心内容是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畜牧经济变换),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型(标志是金属工具和文字的使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提升和改造外在世界能力的增强,社会变迁赢得了加速度。如果说,前述两次转型的完成,历时数以千年计,那么,在文明时代,某些社会转型往往经数百年便大体完成。以中国历史而论,周秦之际的两三百年间,曾发生从领主制社会向地主制社会的变迁,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体制乃至观念形态均有大更革,清初哲人王夫之将战国时期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是颇富历史感的概括;此后发生的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更革、唐宋之际的社会更革、明清之际的社会更革,均在百十年间实现。与这些社会更革相互推引,其间学人们展开了风姿卓异的精神创造活动,构成中华文化史上璀璨夺目的篇章。

若就社会变迁的深刻程度而言,可与前述蒙昧时代走向野蛮

时代,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这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相类比的,则是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转型。在长达数千年的文明时代的前期和中期发生的种种社会异动,大体都是在农业—宗法社会内部的局部变迁,而近几个世纪渐次扩及整个世界的现代转型,则是一种全局性的社会质变,其变化的广阔度和深刻度,均不可同日而语。

二

近几个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现代转型,基础性内涵是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转化,其显著标志是,有机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机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接替,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原料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顺应自然”演为“征服自然”,“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与物质文化层面的巨变相表里,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日益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枢纽由身份演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共享。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则分别由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壮大而逐步得以实现。

上述是就现代转型的世界通义而言的。这种现代化的通约性,在物质文化层面表现明显,而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层面,通约性固然无庸忽略,但民族特殊性也各展丰姿。

三

以世界之大,各地区、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颇不平衡。就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而论,是以14—16世纪南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的,此间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其文化标志,学人代表则有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文化巨匠;这一转型的富于力度的展开,则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继起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其文化标志为启蒙运动,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洛克、哥德是启蒙时代的学人翘楚。成长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殖民扩张又延至北美,进而波及全球。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洲四海的人类无论自愿还是被动,均渐次汇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14世纪,正式展开于18—19世纪的现代转型是从中世纪的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可以称之“内发自主型”。对于西欧以外所有其他地区而言,现代化过程虽然各有不同程度的内在动因,却都是在世界历史已经走向整体化之际逐步实现的,也即在西欧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与示范之下得以发生,因而其现代化可以称之“外发次生型”。

西欧以外地区的“外发次生型”现代转型,又大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文化十分落后,如北美洲和澳洲,欧洲人前来殖民时,当地人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连同人口,全盘迁徙而来,因此,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文化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那里出现“新英格兰”、“新威尔士”、“新奥尔良”等地名,正是欧洲文明整体移植的表征。另一种类别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文明传统,如埃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都有数以千年计的文明史,欧洲近代文明来袭之际,这些国度虽然尚滞留在“前近代”,却不同程度地拥有

与外来的欧洲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度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类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全盘欧化”,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化合反应,就当地人而言,既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也要实现文化的民族性因革。这两者间虽包藏着统一的内蕴,却往往在相当长时段呈现相互矛盾、彼此抵牾的外观。而作为这些地区文化重建任务担当者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即本丛书所称的“学人”)特别敏锐、深切地感受着并且反映着这种矛盾性。

四

近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是19世纪中叶以降“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世纪末叶方开始出现,20世纪则艰难曲折地成长。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中国的中产阶级底蕴不足,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经济上、政治上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宗法—专制势力的依附屈从,而且,因为中国历来缺乏市民政治独立、文化自主的传统,故而中国中产阶级在精神上患有先天软骨病,既无力量,也无胆略充分担当起社会重建使命,于是,这一日渐紧迫的任务连同文化重建任务,一并落到同样发育并不充分的知识分子肩上。而中国知识分子则义不容辞地一身二任焉,这除了客观条件所使然(如中产阶级未能充分担负分内责任)之外,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渊源与特色大有干系。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是春秋战国以来绵延两千余年的士大夫。作为现代社会和新的世界背景的产物,身着西服(或中山装或毛式服装)的知识分子在时代意识、知识结构、角色认同等方面均与长衫博带的士大夫颇相径庭,特别是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基本摆脱了君统与道统的双重负担,不再以“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为行事作文基准,其生活路径也大体走出了“学

优登仕”的故辙。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虽脱下士大夫的长袍,但在精神上却承袭着士大夫的某些传统特质。以本丛书涉及到的诸学人为例,大多有直接的士子经历,且不论魏源、冯桂芬辈均有功名,并曾入大吏幕府,或一度执掌州县,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梁启超是前清举人并出入宫廷及大吏门墙,即如鲁迅、陈独秀,也都有“三味书屋”式的传统教育背景。他们大体都是从士大夫走向知识分子的过渡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保有传统士子心态是情理之中事。

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阶层序列是“士农工商”,与商人自陪末座相对应,士人历来居四民之首,不仅自视国家栋梁,也被社会认作人中精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孟子·告子下》),便是士子豪迈情怀的写照。在认知层面,士人以“求道”、“闻道”、“弘道”为旨趣,以先觉觉后觉、先知觉后知为使命;在政治层面,士人以“平治天下”为目标,但这一目标往往要在依附君权的情形下才能得以实现,由此造成士人“忠君”、“事君”特性;士子又秉承先秦以降的“民本”传统,有着“亲民”、“为民”倾向,故常在“尊君”与“重民”间徘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是他们二重心态的流露。汉代的选举制,尤其是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将士人的治世追求变为活生生的制度性现实,也将士人与君权维系在一起。总之,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师”与“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19世纪中后叶以降,中国传统社会格局崩解和重组,但从士大夫转变而成的知识分子虽有日益“边缘化”的趋向,多已走出“忠君”、“事君”故辙,却并未忘却“平治天下”的使命和充当大众精神导师的任务,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知识分子和西方中产阶级分别担当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一肩挑起的历史因由。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将中国现代学人的双重使命感精要地表述出来。

五

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古今更替、中西交会的大转折时期,具有过渡性时代的全部复杂性。这种过渡时代向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提出的使命,不仅有文化的古今转换,还得面对文化上的民族性传承问题。而中国近现代学人大都在少年时代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多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青年时代又沐浴欧风美雨,不少人曾留学东西洋,其知识结构兼有“子曰诗云”的中学和涉及声光化电、艺文哲思的西学,成为时代性上的“古今过渡人”和民族性上的“中西边缘人”,其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和情感系统呈现多重性,其社会实践(包括学术实践)更异彩纷呈。转型间的中国学人,有的坚守民族文化本位,却又吸纳了西学的某些成分(如梁漱溟、熊十力);有的呼唤“全盘西化”或“全盘世界化”,却实则植根本土文化(如胡适);有的早年力倡西学,晚年又回归东方文化(如严复、梁启超)。而这批转型间的学人都有深刻的传统文化情结,即使那些激烈倾向西化的学人,实则理智向着西方,情感却执著于东方。这些都是过渡时代文化二重性的表现。

自19世纪中后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迭兴之际,到20世纪上半叶的数次文化论战,中西体用问题一直是热门话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常用语,而批评此说的论者也言之滔滔,自成理路。这正是国人为着求得文化二重性矛盾解决方案所作的努力。时至20世纪末叶,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文化讨论再度兴起,中西体用之辨仍然是一大题目,在“中体西用”说之外更出现“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诸说。有人认为这种旧题重说表现了文化讨论的缺乏新意,我却以为这一回环现象正显示着文化二重性矛盾继续困扰着当下国人,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此无可规避。仅仅在这一意义上,反顾并总结本丛书诸传主的心路历程和思维教训,也是大有益处的。

六

转型间中国现代学人各有专业领域,其中一些人在其学术天地足以同古哲媲美,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堪称富于创识的文化大师级人物,他们在文化重建方面的贡献,令人景仰。本丛书传主中王国维之于史学与文学、鲁迅之于文学、胡适之于学术多种门类的建树,均可谓丰碑。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学人作为士大夫传人和现时代的精神导师,又身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抱道忤时”的忧患意识,不少人还保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性。有些人(如王国维)虽远离政治,却以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托命者自况,怀抱高远,绝无降格为技艺之士的意向。由于这些品格的作用力,加之客观环境的挤兑,如内忧外患的中国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以致相当比例的中国学人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是走进书斋、实验室潜心于文化建设,而是以文化人和社会良知体现者的双重角色,投身民族救亡、社会变革、大众启蒙。低吟“布衣老大伤怀抱,忧国无端有叹声”(《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的康有为,虽也有构筑庞大思想体系的努力,但有欠精当,他的闪光处却在鼓动变法,导演“百日维新”的悲壮剧;康氏弟子谭嗣同则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献身菜市口,演出戊戌变法最惨烈的一幕,人们纪念于此,显然远过于对谭氏颇有拼凑感的《仁学》一书的关注。至于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命的邹容、蹈海自尽以警醒国人的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军》、《狮子吼》、《猛回头》、《警世钟》等,其革命鼓动功能大大超迈其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蔡元培的美学论著虽不乏会通中西的努力,但毕竟有欠深刻周详,他的伟绩乃在以民主精神、“兼容并包”气度创办中国新文化的摇篮——北京大学。新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青年时代即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白话小说文学价值不朽,但他创作此类篇章意在“为社会”、“为人生”,而并无意挤进“纯文学”的殿堂。

总之,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本丛书传主多处在此阶段),中国学人虽然也致力于文化重建,在这方面功不可没,我们今日从事的文化工作必须以他们的先期努力为基础,但本丛书传主们作为那一时代最活跃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往往直接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之中,成为活动家及领袖人物,或者响应革命前驱的“将令”,使自己从事的文化工作隶属社会改革,成为其工具与武器。纯粹学科意义上的文化重建,当时常被视作不急之务,少数潜心于学科建设的文化匠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长期被社会所冷待,然而,他们的默默耕耘,实乃转型间文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日渐彰显。本丛书兼收这两类学人,其意在全面反映转型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风貌,并显现其各自的价值。

七

本丛书的各位执笔均是中青年人文学者,对传主有相当研究,而作为新一轮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亲历者,他们对转型时代自有新的体验,这正是对前辈学人心路历程能够得以理解并进行诠释的现实基础。

本丛书的总体设计是否略有创意,各篇的具体展开是否精当,在众多的近世学人传记中,本丛书是否有特别的存在意义?对于这些,实在没有把握,尚待读者诸君阅后评判。

1998年4月上旬构思于武汉大学
4月下旬成文于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校舍

序 一

王庆成

夏春涛同志的新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已经完稿，即将出版。我了解一些他写这本书的情况和甘苦；从题目到研究到写作，从资料到内容到观点，我都稍有所知。我很高兴为这本书写几句话，但由于我因病在外休养，手边没有他的书稿，也没有参考材料，因而这些话可能很空泛，不贴切。

洪仁玕不是无名人物，谈洪仁玕不是冷僻的题目。近几十年来，关于洪仁玕的论文书籍，我想至少总有数十篇册，可以说，过去的研究已有相当的基础。我曾认为，我们过去的历史论著，很多是“轻骑式”的，穷尽性的研究较少。由于这种情况，不少过去的研究题目仍有继续研究的余地，甚至还有很大的余地。我想关于洪仁玕这一题目正是这样。我现在记不准确既有的关于洪仁玕的论著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成就，但我觉得，过去研究中对洪仁玕的生平事迹留有空白点，尤其是关于他后期在太平天国任职以前的事迹。约近二十年前，我曾提出希望有人研究洪仁玕在香港几年的状况，这是一个盲点。但我自己却是只说不做。如果不去填补空白，而在空白处随便涂色，那就只会造成困扰。如洪仁玕自述在香港结识了一些西教士，他到南京参加太平天国后提出过一些与原先不尽相同的政策，于是认为这是受西方派遣企图改变农民革命性质的阴谋。当然，这样的论断不可能有持久的说服力。论者对洪与西方究竟有哪些交往，并未研究，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和情况也所知甚少。事情并不清楚，就作出很大的论

断。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不深入往往是不正确的重要原因。当然，不正确还会有别的原因；不能摆脱历史比附的方法，忽略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也常是重要的原因。

春涛同志这本书在深入和科学两方面都大大前进了一步。它从洪仁玕的早年经历，从洪仁玕接受洪秀全的影响信仰上帝和响应金田起义，到流亡香港、长期与西方传教士接触，到辗转数千里来到困难中的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担当重任，以及他为太平天国所提出的建议、政策和由此所体现的他的思想，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军事外交中所进行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和弱点，等等各个阶段各个方面，都作了相当详尽的研究和论述，从而有可能对洪仁玕的一生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作出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如前所述，洪仁玕在香港的几年，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上是空白，在太平天国几年的事迹也颇有模糊之处，而本书在充分利用常见史料之外，更根据洪仁玕与外国有较多接触这一事实而化费气力，从数十种西文记载西文论著中，挖掘出很多宝贵的资料，同时也利用了近年新发现的洪仁玕本人留下的重要文献，这就大大丰富了洪仁玕的形象。十分用力于发掘、利用资料，又有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我认为，这就是春涛这本书的主要特色。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人物。不少太平天国人物都值得进一步研究，都对太平天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意义，而对洪秀全、洪仁玕的研究尤其如此。春涛这本书认为洪仁玕是当时学习西方的杰出代表。我对当时的情况未曾仔细研究，只有粗略的看法。19世纪50年代末洪仁玕为太平天国提出的对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外交进行革新的政策纲领，我想是前无古人的；在若干方面差堪比拟的，恐怕只有稍后的著有“校邠庐抗议”的冯桂芬。至于和太平天国对立的几位“中兴”名臣，他们关于“洋务”、“自强”的一些见解和作为，比较起来，不免更为瞠乎其后。人们似乎喜

欢把太平天国与它的对立者作比较，那末，上述的比较是否也可以备一格呢？当然，洪仁玕的政策没有机会付诸实施，因而它主要在思想史上有巨大意义；然而，得到洪秀全同意的洪仁玕的主张没有条件见于实践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应归咎于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对立面？我想这也许难以确切回答。但如果以上的比较可以成立的话，那末，对洪仁玕的事业和思想的研究，必能启发人们对近代中国历史作更多的思考。

1998年11月

序 二

祁龙威

一九九二年，春涛撰《太平天国宗教》，予为之作序。其后春涛出访美国，与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等游，视野益宽，学益大进。旋又得王庆成教授从台湾所录洪仁玕“供词”七件及亲笔诗句。于是钩稽中西史料，奋笔撰成此书，颇多新意。国际同行谓为将太平天国史研究推进到一新阶段，实非过誉。予老病颓唐，乐睹春涛在庆成兄指导下，治太平天国史续有成功，特附数语以志盛事云云。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目 录

总序/冯天瑜	1
序一/王庆成	1
序二/祁龙威	4
一 早年经历	1
1. 科场落魄	1
2. 信奉上帝	5
3. 进退踌躇	14
4. 响应起义	22
二 流亡香港	34
1. 19 世纪中叶的香港	34
2. 洪仁玕在香港的交游与 经历	46
三 “英雄从此任纵横”	62
1. 千里来京	62
2. 总理朝政	66
四 《资政新篇》	71
1. 崭新的近代化纲领	71
2. 历史评价问题	86
五 宗教思想	108
1. 太平军中的“马丁·路德”	108

2. 原因试析	132
六 外交思想	156
1. 新的国际观念和外交 政策	156
2. 洋鬼：中国之患	171
七 文化思想	199
1. 糅合儒耶的尝试	199
2.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	218
八 社会改造思想	227
1. “新天新地新世界”	227
2. “不刑而自化，不禁而 自弭”	240
九 “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 偷生”	245
1. 宦海沉浮	245
2. 苦撑残局	277
3. 魂归天国	291
十 结束语：洪仁玕的人生轨迹 和心路历程再认识	301
附录一 洪仁玕著述目录	308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11
后记	321